

城市规划历史



董鉴泓 主编

HISTORICAL &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URBAN PLANNING

与理论研究

同济大学出版社

(本书由金经昌城市规划教育基金会资助出版)

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研究

董鉴泓 主编



同济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研究/董鉴泓主编.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10
ISBN 7-5608-1984-2

I.城… I.董… III.①城市规划-历史-文集②城市规划-理论研究-文集 IV.TU98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3794 号

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研究

董鉴泓 主编

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20009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大丰市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16 印张:11.25 字数:350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18.00 元

ISBN7-5608-1984-2/TU·287

目 录

城·市·城市	董鉴泓(1)
中国城市建设与文化的历史特征	董鉴泓(4)
中国古代城市的规划布局艺术与规划思想	董鉴泓(8)
我国古代若干特殊类型的城市	董鉴泓(12)
隋唐长安城与北宋东京(汴梁)城的比较研究	董鉴泓(14)
宋东京(开封)的改建扩建规划	董鉴泓(20)
雁北边防城堡调查简报	董鉴泓、阮仪三(23)
清代的票号中心城市——平遥、太谷	董鉴泓、阮仪三(28)
中国近代城市的发展与变化	董鉴泓(32)
中国近代一些城市规划图的评析	董鉴泓(36)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关于城市建设工作的若干问题	董鉴泓(48)
苏州旧居住区调查报告	董鉴泓、刘利生(55)
庭院式居住区研究性规划设计方案的探讨	董鉴泓(60)
城市规划工作面临的新问题	董鉴泓(67)
对城市规划工作的一些反思	董鉴泓(70)
关于中国传统城市规划理念的一些探讨	董鉴泓(74)
阿尔及利亚的领土整治规划	董鉴泓(79)
浦东的开放开发与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关系	董鉴泓(82)
海南特区规划中的市场经济影响	董鉴泓(87)
城市规划学科的动态和展望	董鉴泓(90)
城市规划专业 45 年的足迹	董鉴泓、李德华(92)
汉唐西域古城研究	滕序(96)
中世纪西欧与中国城市形态与发展比较研究	吴承照(136)
辽代的都城规划建设	卢诗华(140)
金代上京城的历史发展与城市规划	卢诗华(148)
东北移民垦殖与近代城市发展	吴晓松(154)
日本殖民时期台湾近代城市规划的发展过程与特点(1895 ~ 1945)	李百浩(162)
连云港城市用地形态的历史发展	宁森(168)
后 记	(174)

城 · 市 · 城 市

董鉴泓

本文主要根据国内一些史料,参照国外一些论述,探讨城市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特征。

现在一般对城市的定义是:有一定数量的非农业人口为主的集居点。它区别于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农村。至于行政上是否有市的建制,从学科意义上讲,并不是必要的条件。是否有防御设施的城墙,对现代城市,则更不是其特征。

城市的产生一般认为是从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在原始社会中由于人类第一次劳动大分工,即农业的出现而形成的固定居民点,由于人类第二次劳动大分工,即商业、手工业从农业中分化出来,居民点分化成为以农业为主的乡村和以非农业的商业、手工业为主的城市。

我国古代城市的产生与上述情况基本一致,从我国古代许多文献史料看,先有城、后有市,城与市结合在一起,就是具有商市的固定居民点,就是最初的城市。

下面分别论述城、市、城市。

一、城

城是一种防御性的构筑物。

中国古文字中,“国”字即“或”字,“或”字“𠄎”象形以戈守口,“口”与“土”义同;口象形,土象意,故“国”与“城”义也相同:《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即“工匠营建城墙”。

古文字中“𠄎”、“𠄎”均可作“城”解。可见当时的城,有的为土筑,有的是沟池,有的是木栅栏。这种情况在一些考古资料中已得到证实,原始社会后期的半坡遗址外面有一条沟,城子崖遗址中有一段夯土墙,内蒙东八家石城遗址四周为天然石块堆砌的城墙。

原始社会居民点的这些防御设施,主要是防御野兽的侵袭,也因部落间的战争具有防御作用。

这种城只是设防的固定居民点,还不是城市。

古代文献中常提到“邑”,在《周易·卦辞》中邑字𡩶,象形土地和人民,即生产对象和劳动力。可见“邑”泛指所有的居民点,并不是指城市。

奴隶主居住的是大邑,四野农夫居住的是小邑,小邑住十家称“十室之邑”,田在邑外,一邑有田十亩。奴隶主有若干邑,即是有若干田地及若干家农夫,代表他的领地和财产。春秋时邑扩大,但仍称“百室之邑”、“千室之邑”或“百乘之家”,十室有一乘战车,故“百乘之家”即“千室之邑”。

《尔雅》中载:“邑外为之郊,郊外为之牧,牧外为之野,野外为之林”。可见邑与农牧林等生产用地的关系,这种邑实际指一般的农村。中等的邑有时有市,称“有市之邑”如韩国之中七十邑有市,可见不是所有的邑都有市,有市之邑,即城市型的居民点。

古代有城与廓,甲骨文中  应释“𡩶”,即今之“墉”字,也可以释为廓,因为“廓”在古文字中作,“廓”、“墉”古代本为一字。字中○象形城垣  象形城门。可以推测出殷代的廓有的两门,有的四门,门上有城楼。可见廓与城都是居民点的防御性构筑物。

传说中夏代就已“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三里之城,七里之廓”、《管子·度地篇》中:“内为之城、外为

之廓”可见城小廓大,城在内廓在外,奴隶主住城中,一般人民住廓中。从春秋战国留下的一些城址看,鲁国滕城的内外城,赵国邯郸的东西城即城与廓。齐国临淄的大城为廓,东南角的小城为城。一般城无廓。这里的城就不仅是防御野兽的侵袭,而是奴隶制后由于阶级的分化,城也是为了保护奴隶主的财产和安全。这种情况在古埃及的卡洪城,古巴比伦比吾珥城及巴比伦城中均有类似的奴隶主居住的小城或内城与一般人民居住的大城或外城的区分。

二、市

“市”指交换场所。原始社会后期,生产力提高,有了剩余就产生了交换。起初这种市并无特定的场所。《周易·系辞》:“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会天下货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后来生产进一步发展,剩余也多,逐渐过度到私有制。交换经常化、交换的数量大,品种多,就产生了专门从事交换的商人,这就是人类第二次劳动大分工,商业、手工业从农业中分化出来。

《周礼·地官》:“五十里有市”“大市日昃而市,百姓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五十里有市,大致上可以做到人们去市交换日中可达,当天可来回。日中的市为一般人民交换,早市座商为主,因为一般人民还未到达,夕市贩子为主,因为可以压价收购。

古代常将“市”与“井”连在一起称“市井”。因为市在居民点中,即在邑中,居民点中必然有井。《易经·井卦》:“改邑不改井”,说明邑可以迁,井一定要有。《史记·平准书》注:“‘师古曰,古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将货物于井边卖买,曰市井’就是说人们每天要在井中打水,顺便就在井旁交换剩余物品。也有一种说法,市中必然有井,交换前要在井中洗濯物品清洁后再交换。

三、城市

“城”与“市”结合在一起就是“城市”,即不同于农村居民点,具有商业交换职能的居民点。城市是一个社会经济的实体,具有经济上的特征。

城市是一般的固定居民点,由于第二次劳动大分工而分化出来具有商业、手工业职能的居民点。早期的城市与现代意义的城市不同,非农业的商业、手工业不一定在城市中占主要地位,城市中农业人口的比重仍较大,城市与乡村的区别也并不大,齐国临淄城已是奴隶制的都城过度到封建制时代的都城,有记载,商人的住地要近市,农民的住地要近城门,可便于至城外农田去耕作,可见城中还有不少农民。早期的城市中更可想而知。随着生产的发展,商业更发达,手工业分工更细,城市中非农业人口的比重日益增加,城与乡的区别也日益显著。

是否有城墙并不是城市不可缺少的标志和特征,城市与一般居民点都具有防御设施的城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国有的农村居民点也有设防的城墙和城门。欧洲封中世纪封建领主居住的城堡,也有设防的深沟高垒,但从性质上讲,还不是城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用石墙、城楼、雉堞围绕着石造或砖造房屋的城市,已经成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中心,这是建筑艺术上的巨大进步,同时也是危险增加和防卫需要增加的标志。”综观这一段引文后的全文,这里的城市是私有制及手工业与商业分离出来后的产物,与原始社会一般的设防居民点有明显的区别。

“城”与“市”的结合也表明了城市产生的时代特征,有了剩余和交换,出现市,是私有制产生和发展的结果,私有制也使原始社会逐渐解体,过度到奴隶制社会,而城市正是在这一过程(相当漫长)中产生的。

传说在公元前 22 世纪的夏代以前,仍为原始公社制,如财产公有及禅让制度等,在距今 5000 年前的仰韶、龙山、良渚、青莲岗等文化时期的大量原始村落遗址中也证明了这种情况。

《礼记·礼运篇》中所描述的所谓“大同社会”情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男有分(工作),女有归(生活可靠)。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生产品共同所有),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各尽所能)。是故谋闭而不兴(不欺诈争利),盗窃乱贼而不作(不偷盗掠夺),故外户而不闭(没有私有财产,不用关门)是谓大同。”

随着生产的发展,私有制的产生,这种原始公社逐渐解体而缓慢地进入奴隶制社会,传说中的夏禹传子而不禅让,标志着已进入私有制的奴隶制社会。

《礼记·礼运篇》中描述了小康社会:“今大道既隐(原始公社解体),天下为家(变公有为私有)……货力为

己(财产私有)大人世及以为礼(下一代人继承财产被认为是当然的事),……城廓沟池以为固(保护生命及财产)……以立田里(土地私有)……是谓小康。”

其中城廓沟地,都是防御构筑物,但是与原始居民点的这种防御设施的功能已有不同,主要不是防御野兽的侵袭,这时人们集居多,防御的武器也比原始社会的石器先进,野兽已远离居民点,其功能主要是保护私有财产。夏代“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说明筑城的目的是保护奴隶主的安全及私有财产。

城市的产生是伴随着私有制而产生的,这一过程相当漫长,不能说先有私有制然后才有城市,更不能说先有城市后有私有制。私有制产生了阶级分化,因此把城市的产生和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的分化联系在一起,正说明了城市产生的时代特征。

综上所述“城”与“市”的结合成为城市,既说明了城市的社会经济时代的特征,也表明了城市产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这也表明城市从它产生时就具有商品经济的某些特征。

有人不同意城市是私有制的产物的提法,认为应该提城市的建造是私有制产生的基础,如果这里把“城市”与“城墙”混同,很难说清修建城墙如何会产生私有制,原始部落中修建城墙等都是集体劳动的。如果这里的“城市”和我们理解的具有经济特征的城市相同,也很难解释,已经有了剩余、私有财产,产生了有交换职能的市,居民点已分化为农村型和城市型,如何又成为私有制产生的基础。

用现代的观念来理解古代的事物,是一种糊涂的看法。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因此认为把城市的产生归功于私有制,是给城市带上了错误的阴影,甚至认为这是对城市的极左观点的来源。事实是,从原始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发展,产生剩余及私有制,原始公社生产关系逐渐解体,而过度到奴隶社会,这正是社会在发展在前进,私有制当时也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城市在这个时期中产生是社会进步的结果。至于在阶级社会的城市,由于土地私有、阶级剥削等造成种种恶果,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不是本文论述的范围。

上面的问题只论述古代城市的产生,至于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城市的含义和特征,也不尽相同,而现代意义的城市性质和特征,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本文虽然主要论述我国古代城市的产生,国外一些地区古代城市产生的过程和特征也是相近的。

1983年10月

(此文原刊于《城市规划汇刊》)

中国城市建设与文化的历史特征

董鉴泓

中国古代城市发展与建设的一些基本特征,要与同时期的西方城市比较和对照,更可以显示出其历史的,也就是基本的特征。本文着重从文化发展这一脉络,对下面几个问题进行一些探索。

一、中国古代文化的长期不衰与古代未曾出现过城市衰落的历史现象有关

古代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也是古代城市产生及发展最早的地区,其中只有中国古代文化长期延续不衰。

埃及、巴比伦城市产生的时代比中国早,古代文明也十分灿烂,但后来均中断,只留一些古代文化的遗迹,巨大的金字塔、狮身人面像、神庙,古代遗址等供人凭吊。号称古代奇迹的巴比伦城的空中花园,也只能成为“天方夜谭”中的神话。印度古文化的延续时间较埃及巴比伦长,但在公元 10 世纪后也因异族异教的统治而中断过。至于中南美的印加文化,只留下那些被认为是天外来客创作的“永远猜不透的迷”。

欧洲的希腊罗马时代也曾是古代文化的中心。雅典卫城的神庙,精美的雕刻,规划完善的城市和广场。罗马帝国时期曾驱使大量奴隶去建设一些规模很大,设施水平很高的城市,当时首都罗马人口曾达 100 万,有工程浩大的输水工程,有保存至今的宏伟的斗兽场及一些建筑和广场。

公元 5 世纪前后,当时北方的日耳曼人南下,罗马帝国解体,欧洲形成许多小的封建国家,封建主在乡村修建了许多设防的城堡,成为其统治中心,生活的中心转入乡村。日耳曼人以农牧为生,文化较罗马落后,他们不需要城市,欧洲进入一个城市衰落的时期。罗马城人口降至 4 万人。从公元 5 世纪至 10 世纪,大约五六百年间,欧洲成为一个宗教、神权、封建主统治的愚昧时期,古希腊罗马的灿烂文化中断。

据文献记载,我国夏代(公元前 1771 ~ 公元前 2207)即已有设防的城市,均较埃及巴比伦的早期城市晚。商代的城市在河南省已发现遗址多处,周代城市已具有较完整的规划制度。史学界一般认为春秋战国之际是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度时期。许多小的封国经过战争,兼并为七个大国,这个时期也正是古代一个城市建设的高潮时期,七个大的都城规模都很大,齐国临淄城人口达 7 万户,估计在 30 万人以上,燕国都城下都,两城并列,面积达 32km²。城中有许多大型建筑的夯土台,还有尺度很大的瓦当及陶排水管。吴国都城是吴王夫差命大将伍子胥修筑,其基础保存至今。楚国都城郢都非常繁华,号称“朝衣鲜而暮衣敝”秦都咸阳规模更大,跨渭河两岸。这时期也正是古代诸子百家争鸣的文化繁盛时期,这个时期从未出现过城市衰落及文化传统中断的现象。

欧洲及中国在奴隶制的封建制转变过程中,在城市发展上为何有如此显著的差距,这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不是本文所能涉及,但是有一点是很明显的,欧洲的这种社会的更替与民族的迁移,统治民族的更换是同时的,而中国是在未发生民族统治更换的情况下,在社会经济的范畴内,经济制度由奴隶所有制的地主土地所有制转变的结果。

人类社会经济和文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城市是用石头写成的人类历史”“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城市未曾发现衰落的现象,是文化传统保持昌盛不断的必要条件和重要的原因。

二、中国古代文化长期延续的重要表现之一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制度与传统的延续和发展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虽然有过多次的改朝换代,也有过多的大分裂。但是大部分时期是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封建国家。多数朝代也是汉民族为主建立的王朝。

中国在两千多年中有过几次较大的分裂,如东汉末年的三国、东晋末年五胡乱华之后的南北朝、唐宋之间的五代等。其间也有过几次民族大迁移及大融合,也有过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统治,如南北朝时期的北方一些朝代,宋代与辽、金、西夏的对峙,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满族建立的清朝等。但古代传统的文化从未中断,传统的城市规划制度也延续发展。

东晋末年是一次历史上民族大迁移,大融合。北方一些经济及文化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在战乱中依靠武力夺取政权,建立政治统治。但其统治者认识到本民族文化的落后,决心学习汉民族的先进文化,鲜卑族的拓跋氏建立的北魏,原来建都平城(山西大同),为了进一步学习汉族先进文化,孝文帝拓跋宏力克各种阻力,决心迁都洛阳,在汉魏洛阳城的基础上,按汉族的城市规划传统扩建路阳城。使该城成为延续及发展传统城市规划制度的实例,隋唐长安城的布局很大程度上继承发展了北魏洛阳的布局手法。

唐代在松花江流域建立政权的渤海国,其都城上京龙泉府,(城址在今黑龙江省宁安境内),在布局及形制上完全模仿唐长安城。

辽金等少数民族的统治阶层也曾在东北及北方建立政权,但他们也大力开垦农田开始定居,并入关掳掠汉人工匠为其发展手工业及修建城市,“阿保机率汉人耕耘,为治城廓、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先后修建的有辽上京临潢府,金上京会宁府等。

蒙古以强大的武力战胜宋王朝建立对全国的统治。这样一个长期过游牧生活而无定居习惯的民族,没有城市建设的经验,因此元初也曾有一些地区发生过以落后的游牧生活破坏先进的农业生活方式,实行跑马圈地,废农田改牧场,不重视城市等现象,但很快就制止。统治全国前,忽必烈即命汉人刘秉忠规划上都,其规制完全学习汉制。宫城之外的主要建筑物就是学习汉民族文化的标志——孔庙。统治全国后,又命刘秉忠在金中都附近建设新都——大都,其布局较以前任何朝代的都城都更完整地体现了在《周礼·考工记》中所记述的周代王城的布局及制度。

满族未入关前在沈阳地区也进行过城市建设,在具体形制上与汉族不同,如沈阳的故宫,但基本上是仿汉制,在入关统治全国后,在城市建设及建筑上则完全沿袭明代的传统。

三、中国古代城市都有文化职能,城市既是政治经济中心,也是文化中心

中世纪的欧洲曾经出现过封建城堡与城市分离、政治统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的现象,到中世纪后期,城市的地位日渐重要,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的情况才有改变。而中国在6世纪时即已规划及建设了像唐长安这样规模宏大的既是政治经济中心,又是文明中心的大都会。

从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及郡县制后,城市的建制,规模、布局、等级就与行政管辖的体制相一致。按行政地位,区分都城、府、州、县。它们的职能、规划制度,建设项目及标准等均有明显的区分。

城市设有官府衙门,这是一般乡村及集镇所没有的,一般布置在城中重要的地位,有时还修筑子城或衙城加以防卫。

有无孔庙及学宫,也是城市区别于村镇的重要特征,也是区分城市等级的标志之一。元以后对孔子的尊崇达到至高无上的程度,孔子被封为文宣王,其庙宇可以享受帝王宫殿的规格。孔庙也常与学宫在一起,学有府学,县学等不同等级,承担培养学生,举行科举考试等职能,是宣扬儒文化的中心。

东汉洛阳设有全国最高学府太学,学生最多时在万人以上,唐长安不仅是国内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丝绸之路的起迄点,是国际文化文流的中心,汇集了佛教、伊斯兰教、波斯的拜火教等宗教文化,还有大量的外国留学生,其中以日本学生最多。

各种寺庙,包括佛寺、道观、各种神庙、城隍庙等,也是宣扬宗教文化的场所,也是统治阶级传播封建文化意识形态的所在。古代城市到后期,寺庙的数量也愈多,山西有的小城市,仅关帝庙就有十余处。这些建筑规模大,标准也高。

庙宇中有的有一年一度的庙会,有的为定期的集市,有的成为城中市民的生活中心,如开封相国寺、北京的隆福寺、南京的夫子庙、上海的城隍庙等。

官府、孔庙、学宫,各种寺庙也是城市中最突出的建筑群,采用高贵的建筑材料,体量大,标准高,由于受

到历代统治阶级的尊崇和保护。多次的改朝换代(在农民起义中宫殿官府被烧的例子较多),历次的兵火,这类建筑保存下的较少,是城市中少有历史悠久的传统古建筑遗存,成为今天重要的文化名胜古迹。也成为古代城市建筑艺术的标本,它们的存在也延续了古代传统的文化。

四、中国封建社会中重农抑商、重经史轻技艺的思想,影响了商品经济及城市功能的发挥

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思想基础。这是以农民为主的农业社会中,即有广大群众基础,又得到封建统治阶级倡导的思想意识。有的朝代还制定抑商的具体政策。商人虽富有,但社会地位不高,富商要化钱买“功名”。士、农、工、商中士为首商为末。农民中也是安贫而不愿从商。这些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发展商品经济起着消极的作用。

在众多的城市中,绝大多数是各级行政管辖的中心,或是军事中心,经济职能不突出,只有少数位于交通要道的城市发展成为商业都会,如大运河沿线一些城市,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些城镇。

中国古代由于本身的统一及强大,物产丰富,国内市场广阔,长期以来以中央之国自居,闭关自守,视外国为蛮夷,与国外的经济联系很少,虽有著名的丝绸之路,但贸易量小,其沿线城市军事意义大于贸易职能,只有宋元及明初,海上交通曾较发达,明中叶以后,沿海贸易港口不但未发展,有些城市如泉州衰落后始终未恢复。而15世纪后,正是西方海上贸易发达,沿海城市迅速发展成为经济中心,形成以沿海城市带动内地城市发展的形势。

唐宋以后统治阶级倡导科举,引导知识分子醉心经史及八股文,轻视技术及艺术,尽管唐宋以前就有四大发明,不少科学技术当时居领先地位,但未应用于生产,手工业技术长期停滞,未曾出现促进加速社会发展的生产力的变革,城市经济发展十分缓慢。

封建社会后期,作为非农业产业结构为基本职能的城市,由于商品经济,手工业均处于发展缓慢的状态,因而城市也发展停滞,变化甚微。这一情况与西方在15世纪文艺复兴以后情况对照,尤为明显。

五、中国城市受到近代工业革命的影响远较西方晚

欧洲的文艺复兴对城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建筑艺术方面,对整个城市的结构和布局影响并不大。

18世纪开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则对城市发生强大的冲击波,表现在城市化以远远超过以往的速度加快进程,人口向城市集中,大城市迅速膨胀,城市产业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城市出现大片的工业区,仓库区,铁路、汽车的出现突破了马车时代的城市道路格局,新的建筑材料及建造方法,新的功能用途的建筑改变了原有城市的面貌。

就是在欧洲城市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相当于中国的康熙、乾隆时期),中国却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闭关自守的国家。直到鸦片战争以后,近代工业才在沿海地区发展起来,在东部沿海地带及长江中下游,出现一些由帝国主义占领、规划及建设的城市,如青岛、大连,或由设立租界商埠而发展较大的城市如上海、天津、广州、武汉,或因修筑铁路,开发现代工矿业而发展的城市,如唐山、无锡、蚌埠等。但是广大地区的城市仍然停留在原来的面貌,受现代工业的影响很小。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解放。

“一五”、“二五”时期,大部分新建的重点工业项目均布置在内地的华北、西北及西南地区,带动一些城市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近十年来,由于执行了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政策,中小城市的工业发展很快,乡镇工业发展的势头更猛,现代工业对城镇的影响面更加广泛。

欧洲现代工业引起的城市迅速发展,城市中各种矛盾的产生,城市规划科学的形成,一些城市经过规划,改造更新,开始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这一历史过程长达百余年。而现代工业在我们国家迟发生了百余年,而我们却在短短的几十年间经历了欧洲百余年间走过的道路,尤其是近十年,现代工业对广大城镇的影响来势甚猛,以致我们在观念形态上,技术及知识水平上,规划能力物质财富上都感到措手不及。

欧洲在工业革命初期在城市中发生的种种矛盾,如环境的污染,交通的紧张,住宅的短缺,等等,现在正发生在我们多数城市中。虽然这些问题在今天一些发达国家中仍然存在,但其表现的形式,严重的程度,或产生的其他新的问题均与工业化初期不同。而我们当前遇到的问题,大量的属于工业化早期的问题。如何认真研究发达国家城市曾经走过的道路,研究他们的城市规划的经验,使我们不致重蹈覆辙,少走弯路。

今天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对城市问题的评价标准和价值观念均较工业化初期有很大的不同。对城

市环境,特别是社会精神环境的要求,对历史传统文化的观点,与我国有较大差距。科技的发达,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促使了这种变化,也有条件为城市人民满足这种精神的要求。而在工业化早期也曾发生过不重视历史文化传统,拆毁古建筑,建造兵营式的住宅,等等问题。而这种现象,今天正在我们一些城镇中严酷地发生着,建筑的数量大,时间又急,规划设计的水平跟不上需要,建筑形式单调,布局呆板,拆除古建筑及传统民居的现象屡次发生而难以制止,造成千城一面,地方特点及历史文化传统逐渐丧失。这一问题我们是不是也应从国外城市发展的道路上吸取历史的教训呢?这是一个很严峻的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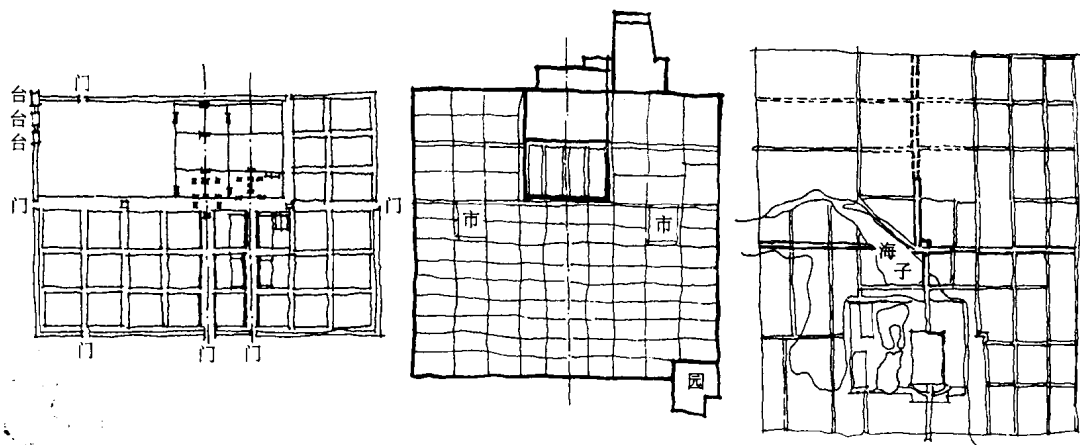
1987年4月

(此文原刊于《时代建筑》)

中国古代城市的规划布局艺术与规划思想

董鉴泓

从周代关于建筑的文献记载中,以及陕西岐山周代建筑遗址的发掘材料中,可以看出一些大型建筑群已采用对称的布局。春秋战国的一些城址中,大型建筑基址的土台也按一定的轴线布置。汉长安城总体布局虽然不规则,但宫殿部分的布局也很严整。曹魏邺城的总体布局就已采用了中轴线对称形式。隋唐长安城在总体中将中轴线对称的布局手法更加完善,城门的数目与位置、道路的格局、市的分布、坊里的大小及划分,均严格对称而衬托出中轴线朱雀大街。又以轴线来正对全城的主要建筑群——宫殿。宋东京(开封)也正对宫城正门开辟宽广的御路。元大都城市总体布局艺术又达到新的高峰。除了南北向的中轴线,还有东西向的横轴线,在其交点建造全城几何中心——中心阁,更加强了城市总体布局的秩序感。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布局,达到更高的艺术水平(图 1)。



(1) 曹魏邺城中轴线布局示意

(2) 唐长安中轴线布局示意

(3) 元大都轴线布局示意

图 1

春秋战国一些城址中的高台,秦咸阳阿房宫遗址的大土台,汉未央宫遗址的土台、邺城的三台,都是以高大来突出主要建筑物。隋唐大明宫的含元殿及麟德殿也建在高台上,但这时以高台加高建筑物的手法已属次要,更主要的是以整体布局,特别是道路的布局来突出主要建筑群。如以 150m 宽的朱雀大街正对皇宫大门及太极宫。在修建大明宫后,又新辟宽达 180m 的丹凤门大街,正对含元殿建筑群。以大量人工建造工程浩大的土台以增加建筑物的高度,毕竟还是一种并不高明的做法。长达 7km 的朱雀大街也嫌过于单调,而在明清北京城的整体布局艺术中就吸取了历代都城总体布局的经验而加以发展,在中轴线上采取多样手法来变化空间效果。主要的宫殿建筑太和殿虽然也建在高台基上,但通过适当比例的关闭性广场及两侧建筑物的衬托,显得更加雄伟壮观。中轴线虽然不如唐长安的朱雀大街长宽,但通过多重城门,东西三座门,东面千步廊,以及广场形体、闭合的变化,还通过形成直线的宫殿建筑的屋顶,宫后的景山及钟鼓楼,使中轴线显得更突出而又富于变化(图 2)。

城市布局及建筑组群运用中轴线对称的手法、与中国传统建筑类型的特征有关。传统的木构架体系的

建筑、体量及跨度不大,较难在一个建筑内部空间划分过多的房间或满足多样功能的要求,因此从小型的住宅建筑中,就采用庭院组合式,以解决居住生活中所不同需要。按封建宗法观念,住宅组群中要区分尊卑主次,往往将主屋建得稍高一些或大一些,配屋设在两侧,自然就形成了中轴线对称的手法。这种布局手法从住宅院落扩大到大型的宫殿及庙宇建筑群,又扩大到整个的城市总体布局。

由低层的木构架的建筑形成院落组群,因而这种建筑空间的概念和空间组合的艺术手法也有自己的特点,室内外空间形成有机联系,又应用廊、墙进行空间的分隔,形成空间在体量、形状等方面的变化 and 对比的手法,不仅在大型建筑群中应用,在城市的大尺度的空间处理方面也应用这些手法。各种城市广场也是建筑组群的封闭形的大空间,实际上也是院子的扩大。

在住宅院落群中,建筑与树木及庭院绿化巧妙的结合在一起,形成良好的环境绿化条件。这种手法也应用于整个城市,使严整的建筑群及城市格局与自然山水及园林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虽然公共绿地的数量不多,但整个城市的树木覆盖率很大。形成中国独具特色的城市园林艺术(图3)。

城市中绝大部分建筑为低层平房的院落式住宅,只有宫殿、庙宇、官府等大型院落式建筑群较为高大。城市中也有少数的多层建筑,如城楼、钟鼓楼、塔等分散地分布在城内,构成起伏变化不太强烈的城市立体轮廓线(图4)。

城门往往是城内主要道路的起点,高大的城门楼也成为道路的对景。钟鼓楼一般跨主要干道,或在交叉口上建造,成为城市大空间构图的焦点。塔在城市中的建造也是城市景观构成的重要因素。塔在起初只是佛寺的附属部分,后来有的塔也与寺院分离,而按“风水”等原因建在山顶或河湾处,使塔成为城市标志性建筑物。塔及楼阁的分布也与道路有一定的关系,如扬州的文昌阁,苏州的报恩寺塔,均是城市街道的对景。在地形有起伏的城市,有的塔建在山顶,如镇江的金山寺塔,杭州的保俶塔,无锡的惠山塔等,丰富了城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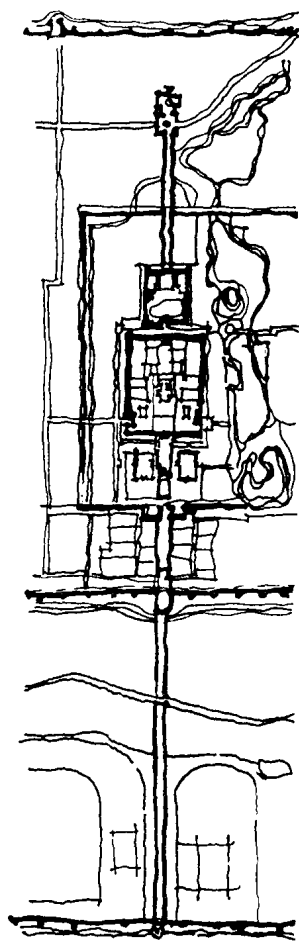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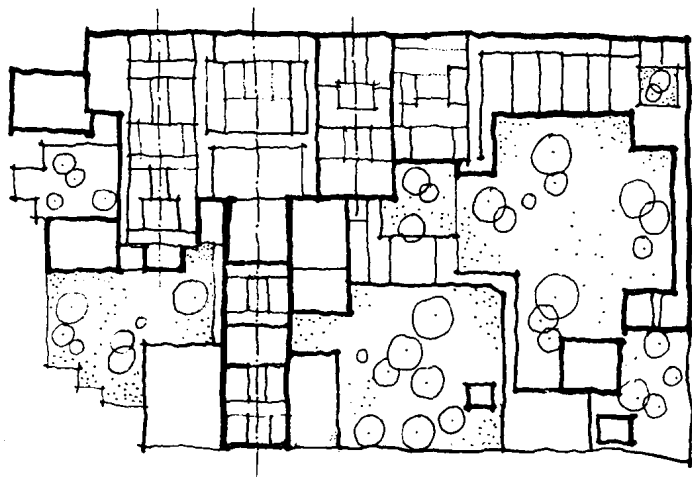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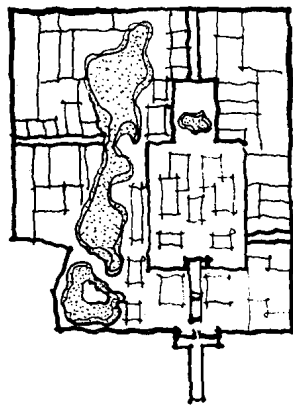


图2 明北京城中轴线的空间变化



(1) 院落与绿化的结合



(2) 城市与园林的绿化

图3

主体轮廓线,增加了城市的景色(图5)。

突出主要建筑物,除了用对称,轴线以及对景等手法,也常运用建筑的色彩及装饰。建筑的色彩严格按照封建等级制的规定,只有宫殿和某些庙宇(如孔庙)可以用黄色琉璃瓦的屋顶,还由于整个城市中有大片的庭院树木,因此在一片绿色及黑灰色的底色中,衬托出某些黄色、红色,有强烈的对比感。

南方水网地区的城镇,有绮丽的水乡风光,河道如网、桥梁横空,通航河道上的拱桥很高大,桥形又丰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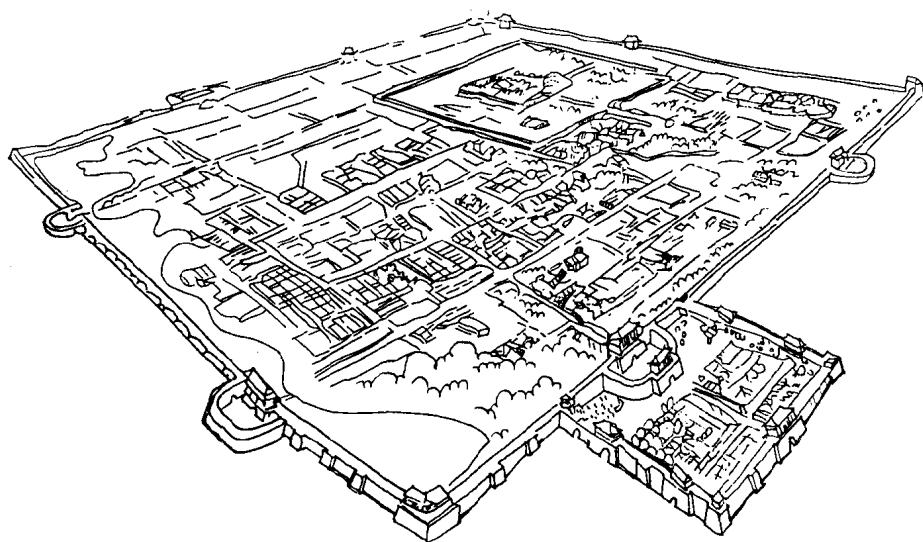


图4 明太原城复原想像鸟瞰示意



图5 塔是道路的对景

变化,桥头又往往形成城镇生活中心的建筑组群,虹桥波影,形成生动的构图。沿河的街道,视野开阔,形成一幅展开的画卷。

古代有些城市中还有意将河流引入城中,除了水流及运输的要求外,也可以开阔城市园林水面、丰富城市景观。

在地形起伏的城市,城市建筑能良好地配合及利用地形,顺山势建造,因建筑体量小又能灵活组合,能巧妙地形成一些错落有致而富有变化的建筑空间,极少破坏自然地貌、开山辟石的作法。道路多采用步行台阶路,更能增加城市景观的变化。

古代城市虽然由劳动人民建造,但制定规划的指导思想则主要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图。在一些完全新建的都城,如隋唐长安城、元大都城、明清北京城、明中都城等,这种意识形态的体现尤为明显。

有些规划思想与周代的一些关于城市建设制度的记载有关,如《周礼·考工记》中有关城市布局的记载:“……方九里,旁三门,九经九纬、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前朝后寝”等等。周代城市是否严格按照这种布局,尚未能证实。但是有一点是十分明显的,就是越到后代,城市总体布局中这些规划思想的体现也越显著。唐长安城中只有部局的体现,元大都则更全面的体现,到明清北京可以说是严格的按照这种规划思想布局。这显然与《周礼》等儒家思想受统治阶级推崇的程度有关。

还有一些属于封建等级制的规制,如建筑色彩、尺度、形制等。也有一些属封建礼制中的具体规定。在城市布局中须严格遵守。如文职机构设在左、武职机构设在右。明初南京宫城部分及明北京城的宫门前六部在左,王府在右,左有文华殿,崇文门,右有武英殿,宣武门。

城市规划思想与古代占统治地位的儒家的哲学思想有关。儒家提倡“居中不偏”、“不正不威”。这种思想直接影响城市规划布局的“宫城居中”及中轴线对称的布局。儒家提倡的礼教尊卑、伦理、秩序也影响到城

市及建筑群的严整、方正的布局。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在城市规划思想中也有影响。如天、地、日、月,春夏秋冬四季,天文星象珍禽异兽等。如唐长安十三排坊里象征十二月加闰月,皇城南面四行坊里象征四季。明北京城南面建天坛、北面建地坛,东面有日坛,西面有月坛。关于兽中四灵“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东为春,南为夏,西为秋,北为冬等概念,均在城市布局及地名方面有体现。皇帝则自命为“天子”,将其宫殿设在至尊天上的地位。

古代还有一些规划思想与久已形成的阴阳、风水八卦等观念有关。如主要建筑物要朝南或朝东,不可朝西或朝北。城市北面往往不开城门,以免对“王气”不利,有时在北城正中建玄武庙。唐长安城皇城南面四行坊,不开南北门只开东西门。据有文献记载,也是为了不冲“正气”。开封在宫城东北建艮狱,因为艮方补土,皇帝可以生子,艮土均为八卦五行中的概念。

风水、阴阳等概念与人类对自然界的原始认识有关,后来又逐渐被人们牵强附会按自己意志解释,或与宗教迷信思想混杂起来,加上一些神秘的色彩也会逐渐形成一些规划制度。形成一些观念,统治阶级又往往利用这些观念宣扬“天人感应”的思想。

城市规划中关于数字的应用,也逐渐形成一种传统的观念。数字本身是抽象和无意义的,但有时也与一些观念形态结合起来。如三、五、六、九等数字,表示尊贵。汉长安城门开三个门洞,唐长安明德门、北京天安门及午门开五个门洞。采用奇数也与突出中轴线布局有关,中间城门往往为帝王专用。唐长安有六街,汉魏洛阳城长九宽六,都城开九门,均含有尊贵的意义。

中国古代并无系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也无这方面的论著。但政治统治制度很完善,有一套规划建设的制度。风水、阴阳五行等概念也逐渐系统化,两者结合起来就形成一些城市规划的思想,对城市布局有很大影响。这些传统的规划制度及规划思想,有一些是封建、迷信的糟粕,也有一些是城市规划建设经验总结,是优秀的规划手法的汇总。有一些是反映古代高度文化及与唯物主义自然观有密切关系的建筑空间艺术的思想。有些是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图,也有一些是城市发展中客观规律与经验的积累。我们需要下一番功夫,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剖析,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以现代的城市规划理论予以评价,为丰富和创建中国化的城市规划理论而努力。

1986年4月

(此文原刊于《时代建筑》)

我国古代若干特殊类型的城市

董鉴泓

我国古代的城市类型,大部以封建行政管辖的体制来划分,如都、府、州、县。一般均为各级封建统治的政治中心及军事中心,职能较为单一雷同,有少数位于江河要道或水陆交会处的城市也同时具有商业都会的职能,如重庆、扬州、武昌、苏州……等。只有少数城市是以手工业为主要职能,如自贡、景德镇、佛山镇等,往往在等级上要低于县,还无资格设置衙门及孔庙、学宫。也有一些按边防或海防的防御体系设置的城堡,如镇、卫、所等,还不具备城市的职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也出现过一些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或某一偶然的歷史事件而建设一些与前述的城镇不同的特殊类型的城市。它们不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主流,但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的特色,也是中国古代浩瀚的城市发展史中的一点花絮。就笔者已掌握的资料,有下面一些比较特殊的城镇。

一、西汉初年的新丰城

秦末战乱,楚汉相争,终由刘邦平定诸霸,建立了统一的汉王朝。刘邦部下多山东一带人,东归思乡心切,刘邦接受了军士娄敬的建议,决定在关中建都,先修复秦代长乐宫,后又建未央宫,至惠帝时方修建城墙,即汉长安城。刘邦做皇帝后把其父母由丰城(后名邳县)接至长安共享荣华富贵,但这位太上皇终日思念家乡,刘邦为了安慰老人,仿照丰城建新丰城,并将丰城父老迁入此城。此城可谓古代一特殊功能的城市,在《古今图书集成》(方輿编,职方典)第五百十一卷有一段记载:“新丰城,在县(临潼县)东十八里。新丰原汉高祖以太上皇思东归,乃于此置县,徙丰人以实之,故曰新丰。并移粉榆四社,街衢棟宇一如旧制,士女老幼,各知其实。虽鸡犬混放,亦识其家,盖胡宽所营也。太公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鞠(踢球)以为欢,故新丰多无赖少年。”据此记载,可能也是世界城市建设史中的孤例。城址今不可考。

二、西汉的陵城

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实行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为了“长治久安”,曾下令拆毁六国城池宫殿,并在咸阳附近仿造六国宫殿,又下令“集天下富户十二万户居咸阳”,并收集、销毁民间兵器,铸十二铁人于咸阳(均见《史记》)。汉朝取代秦朝,也曾执行过将天下富户集中于长安的政策,不同于秦代的是,这些富户不是集中在长安城,而是集中在皇帝陵墓附近,建造陵城。史载汉武帝时:“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徙郡国豪杰及资三百万以上于茂陵。”汉成帝时(公元前32~前8年):“徙五百万以上五千户于昌陵”,“徙一百万以上居平陵”。这种陵城仅见于史载,位置、布局等目前无可考。这类城市集中居住富户,很明显是一些高消费及游闲的城市,后世也以“五陵少年”来代表纨绔子弟。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就有:“五陵少年争缠头,一匹红绡不知数”的诗句。

三、汉代的军市

汉初为抵御匈奴侵扰,汉武帝派兵打通河西走廊,连接西域,使丝绸之路畅通,又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汉代还修建汉长城,位置在明长城北,西端又沿通往西域的商路建设一些驻军的城堡,其间又有通讯联络的烽燧等。一些驻军的城堡均实行“屯垦戍边”,在城堡的近旁就形成商市,主要是为满足驻军的生活

需要,也征收过路客商的税,当时称为军市。《前汉书·冯唐传》:“……臣闻魏尚为云中守,军市租尽以给士卒。”东汉《蔡邕传》:“蔡邕从军河北,为军市令。”军市令为军市主管官吏。汉代城市中的市也设有主管平价收税及缉盗的市令。

明代沿北部长城的内侧也按照防御体系设立一些防卫城堡,居住戍卒及他们的家属,也有一些是充军的犯人及家属。笔者在1963年在山西北部沿长城的左云、右玉、杀虎口等地调查时,住在一些城堡中的农民都自称其祖先是明代当兵及充军来此落户的。

四、明代的王府及王城

明代初年的洪武及永乐年间,全国曾出现一个筑城的高潮,不少地方志均载城池的修建或重修、增修、加砖于洪武与永乐年间。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当在另文中论述。明初修建或改建的城市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城市新建或改建王府或王城。许多原是省城首府的城市,几乎全部有这种王城或王府。如开封的周王府即在北宋故宫遗址的基础上修建,今存的龙亭即为周王府宫殿的一部分。太原的晋王府、兰州的肃王府、西安的秦王府、成都的蜀王府,也称王城。整个成都城因顺应锦江的流向,城市成东北、西南向,但蜀王城则完全是正南北向。即使在一些府州城市,也建有王城,如山西大同的代王府、河北宣化的谷王府。这种王府城在规格上次于北京宫城,但在布局上也有王城的规制,也是前朝后寝及一些宫殿建筑群的布局,相当于一个袖珍的紫禁城。

五、清代的满州城

清兵入关统治全国后,在一些较重要的府、州城均建有驻扎八旗兵的兵营城,一般称为满城。有的在城中,如西安,将明代的秦王城改为满州驻军城。成都则在城的西南部另建一城墙,划出一块作为满城。有的则在城外另建驻军城,或利用原有军营改筑为满城。一般均有城墙与城市其他部分分开,这也反映少数民族统治者与市民的矛盾。

1992年

(此文原刊于《同济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